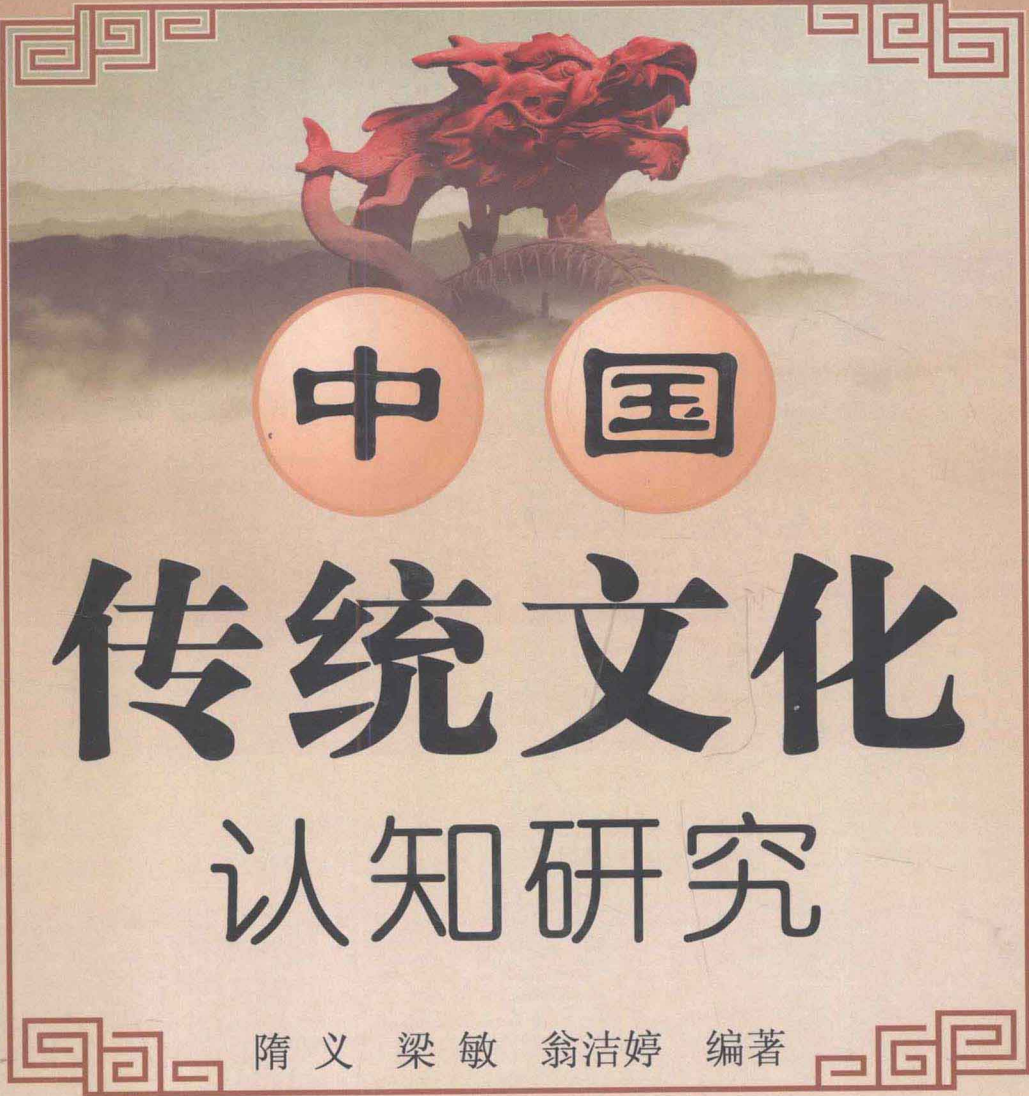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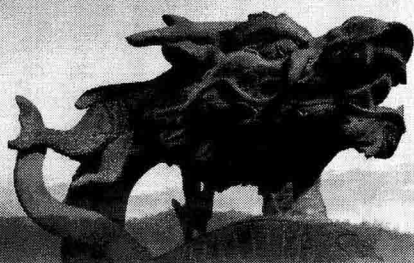




中国

传统文化 认知研究

隋义 梁敏 翁洁婷 编著



中国

传统文化 认知研究

隋义 梁敏 翁洁婷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研究 / 隋义, 梁敏, 翁洁婷编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01-9373-1

I. ①中… II. ①隋… ②梁… ③翁…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921 号

书 名: 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研究
作 者: 隋义 梁敏 翁洁婷 编著

责任编辑: 孟亚黎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875 字数: 410 千字
ISBN 978-7-5601-9373-1

封面设计: 马静静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印刷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特质所在,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尊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把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与传统文化衔接起来,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推动今天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是摆在每一个民族面前的重大问题。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但是它并不全是珠玑,而是混有沙石,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优越性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从明朝中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渐渐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疑,这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产生了种种的思索,并先后产生了“中体西用”说、“全盘西化”说、“儒学复兴”说、“西体中用”说和“中西互为体用”说等。经过不断的探索,人们发现,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应该是采用辩证分析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创造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正是出于在继承中创造出新文化的目的,我们撰写了《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研究》一书。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中国传统文化概况,主要从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及基本特征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概述。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三章至第十一章分别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文化,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文化,中国传统礼仪风俗文化,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国古代科技、医药、教育文化,中国古代军事与工艺文化,中国传统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等九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知研究,概括了这些方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力求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舍提供一定的帮助。本书逻辑清晰,结构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在进行理论阐述的同时也注意用事实加以说明,力图为广大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本书由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隋义、陕西科技大学梁敏、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翁洁婷编著完成,并由三人共同统稿,具体分工如下。

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第十章:隋义;

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梁敏;

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翁洁婷。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著作,引用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在使用中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本书日后的修改与完善。

作者

2012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政治环境 and 经济基础	5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12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及基本特征	20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9
第一节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29
第二节 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	35
第三节 和而不同与三教合一	44
第三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知研究	52
第一节 儒家思想文化	52
第二节 道家思想文化	58
第三节 法家思想文化	66
第四节 墨家思想文化	71
第四章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文化的认知研究	78
第一节 汉语、汉字的历史与特点	78
第二节 汉语与传统思维及价值观	82
第三节 汉语中的语言迷信和文化取向	86
第四节 汉语与社交、地域文化	91
第五节 汉语里的称谓、地名、官称	95
第五章 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文化的认知研究	10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民族宗教文化	101
第二节 中国传统道教文化	107
第三节 中国传统佛教文化	111
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116
第六章 中国传统礼仪风俗文化的认知研究	123
第一节 礼仪文化	123
第二节 服饰文化	132
第三节 饮食文化	139
第四节 茶酒文化	145
第五节 节日习俗文化	150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认知研究·····	155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诗赋·····	155
第二节 中国传统词曲·····	166
第三节 中国传统小说·····	175
第四节 中国民间文学·····	179
第八章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认知研究·····	184
第一节 中国绘画、建筑艺术·····	184
第二节 中国书法艺术·····	193
第三节 中国音乐、舞蹈艺术·····	196
第四节 中国戏曲艺术·····	202
第九章 中国古代科技、医药、教育文化的认知研究·····	209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及传统科学技术·····	209
第二节 中国传统中医学与中药学·····	217
第三节 中国古代教育与科举制度·····	227
第十章 中国古代军事与工艺文化的认知研究·····	23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事谋略·····	237
第二节 中国古代陶瓷、玉器、青铜器·····	242
第十一章 中国传统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认知研究·····	249
第一节 地域文化·····	249
第二节 民族文化·····	256
参考文献·····	263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发展强盛,曾长期居于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对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尚德重义,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持中贵和,收发自如的处世哲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等,历数千年,沉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代代相承,使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景象。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界定

最早给“文化”一词下定义,同时做出最经典论述的是 18 世纪末期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被尊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但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又非常宽泛,如有知识被称为有文化,有修养被称为有文化,有道德被称为有文化等。关于“文化”的界定,我国的《辞海》把它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指的是每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凡是人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由此看来,文化应该着眼于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的本质,它与动物界,与自然界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属于人的,是人类全部创造活动的结果,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都强调:由于文化的出现才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人类社会和一切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应该归属于“文化”。

从狭义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社会伦

^① [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

理道德、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民情风俗、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都属于狭义文化的内容,主要是涉及精神领域的文化现象。

综上所述,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它包括了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的文化则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了意识、观念、心理和习俗等内容。^①本书主要是从大文化的视野即广义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概述。

此外,学界还有人提出了“深义文化”这一概念。深义文化就是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升华得出一种较为普遍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深义文化。因此,深义文化大体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心理状态、心理素质、生活情趣等。这是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早在1987年提出的观点,其《中外文化交流史》云:“深义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②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深义文化”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二、中国文化

本书所提的“中国文化”概念是相对于“外国文化”而言,它是指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在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来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总和。可见,中国文化根深叶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有着异乎寻常的文化渊源。

之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一词,最初并不具有统一的国家实体的含义,而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的概念。1963年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由此可以知道,居于西部地区的周人在建立西周之前,称商人所居之地为中国。《尚书·梓材》记成王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由此可见,在周人心目中,最初的中国是指商人故地,中国人则是指商朝人。后来在《诗经》等文献中亦有出现“中国”。《诗经·大雅·生民之什》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见,中国的“中”字,最早是指中部,而“国”字,本义是城邑。所谓中国,就是居于中部的城邑国家。《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云:“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都说明上古所谓的“中国”,即指后世的“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大,大致位于今黄河中下游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地区。西周以后各代,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能够入主中原,都是以“中国”自居,如十六国北朝之际在中原立国的诸北族政权,均以中国正统自居,而斥东晋南朝政权为“南伪”。

东周以后,“中国”一词被频繁使用。《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云:“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可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公羊

①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认为,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冯教授所说的实际上是广义文化。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②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传·僖公四年》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的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称为“外夷”。明清时期，有时仍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朝。直到晚清近代与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才出现正式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晚明清初之际，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始称明清帝国为“中华帝国”，简称即为“中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廷与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大臣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是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用于处理国际事务的滥觞。

中华也指中国。元朝王元亮《唐律疏议释文》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梁启超《爱国歌》之一：“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中华之名由来已久。“华”原意为光辉、文采、精粹，蕴涵文化发达之意。中华也称华夏，华夏族为古代汉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或华夏又具有民族性含义。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境内各族人民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了自觉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洞开和大量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后，出现了“西学”和“中学”的对举，“西学”指西方文化，“中学”指中国文化。在此之后，“中国文化”才逐渐地成为一个与“外国文化”对举的、有实质意义的概念。

自古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获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和可靠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回答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完成这个转变的时间在距今 400 万年以前。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体质进化，经历了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和现代人等发展阶段。其中，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生存年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至现代人时期，历史已经进步到了新石器时代。

目前，中国南北各地普遍都发现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分布地域达 27 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发现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材料，构成一条相对完整的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数百个旧石器文化遗存材料，反映了近 200 万年间，中国旧石器时代发展的各个阶段，并有着共同的鲜明文化特征。由于中国大陆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各地在气候、物产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诸多自然差异。因此，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文化面貌即已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初步分化成若干相互区别的文化类型。到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在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居住、生息的不同文化族团，创造出了若干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区域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它们在后来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复杂的撞击、裂变、整合，相互影响，不断更新，最后殊途同归，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由此表明，中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中国文化是根生土长的土著文化，有着近 200 万年的历史渊源。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发

展模式不同,数千年来,尽管中国国祚频移,危机迭现,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却一脉承袭,延绵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多元一体的建构格局铸就了中国文化异乎寻常的凝聚力,使得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经久不衰。

三、中国传统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即为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遗产,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个民族的主导文化与核心文化。传统文化虽然发生、开始于过去,但是却贯通于现代,也必将影响未来,所以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由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之际和发展之中具有了综汇百家优长、兼集八方智慧的显著特点。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及时地吸收时代精神要义,不断地实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国文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特别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文化面貌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一切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而且对于今天来说,这一段历史文化也同样成了传统文化。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个消灭一个、一个代替一个的关系,而是新的文化因素注入,过时的文化因素被淘汰,从而变异更新的关系。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能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原因。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与所谓的“封建文化”或所谓的“旧文化”混为一谈。“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世界文化”涌入中国之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获得独立的、确切的概念的。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的是正确地认识世界上、历史上的中国,把握好现在的中国,安排好未来的中国。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不论在何时何地,它都在制约、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为我们继续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政治环境 and 经济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环境

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总要依赖一定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同的地理环境,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文化特性产生的内在物质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人民脚下这片特殊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大地的生态资源和人文地理条件,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基础。对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一个总体性的了解和把握,有利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

(一)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气候变化

中国的西北背靠欧亚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地势走向总的趋势是西高东低,依次递降,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平均海拔高度在4 000米以上。在青藏高原以北、以东和东南一带,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地形极其复杂,海拔高度下降到2 000~1 000米以下,形成第二阶梯。第二阶梯以东,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以东的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低于500米,其中仅少数山峰高达3 000米以上,此为第三阶梯。海拔低于200米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东南丘陵盆地,都在第三阶梯的区域内。

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决定了中国的气候环境复杂多变。

在湿度方面,中国大陆以距海远近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半干旱到干旱逐渐递变的明显趋势。这种斜向的气候大势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出现了东南以农耕为主,西北以畜牧为主的人文地理景观。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以外,一般为半干旱和干旱气候,特别是西北内陆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基本气候特点。

在冷暖度方面,中国大陆由南而北,以山川河流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的渐次递变。大体上说,台南、桂西及滇南河谷一线以南为热带;自此以北至秦岭、淮河及白龙江一线为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汉长城以南为暖温带;秦汉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大兴安岭北端、黑龙江一线为寒温带。

自从直立人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直到如今的数百万年间,中国大陆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仅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万年以来,对大陆的环境变迁作简要叙述。在近万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地形、地貌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范围内,并以海陆变迁、水域变迁、高原变迁、沙漠变迁的表现较为明显。

海陆变迁:受到全球气候冷暖变化以及地质条件变化的影响,此期间曾经历了数次海进和海退的变化,从辽东湾到杭州湾之间,大部分沿岸地区都是在最近两三千年以内陆续成陆的,

但也有部分陆地没入海底。

水域变迁: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河流都曾经历过多次的决溢和改道,从而发生了多次河流、水系的变迁。其中,尤以辽河、海河、黄河、淮河的改道最为频繁。同时,许多著名湖泊的形状都发生了改变,面积也逐渐缩减甚至消亡。

高原变迁:土地的过度开垦使高原地带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可耕面积日益减少,生态环境日趋劣化,特别是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一带甚为严重。

沙漠变迁:由于人类与自然活动的交互作用,沙漠面积日渐扩大,吞没了许多绿洲和城市。

关于气候条件的变化,近万年以来,中国气候总的发展趋势是由暖湿转向凉干。如今气候干燥的辽河上游一带,在距今 8 000 年前,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曾经是温暖湿润地带。^① 据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在距今 5 000 年前至距今 3 000 年前这 2 000 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要高于现在 2℃ 左右。近 3 000 年以来,中国的气温曾经出现了一系列上下摆动的变化,在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400 年、1200 年和 1700 年,曾经出现四次温度最低期,温度的摆动范围为 1℃~2℃。在此期间,在每一 400 至 800 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 50~100 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摆动范围是 1℃~0.5℃。^② 许多先秦典籍都追记在夏朝建立之前,曾经有一个漫长的洪水时期,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但在最近的 500 年间,旱灾明显多于水灾。

(二)地理、气候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类,对地理、气候环境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气候环境中的活动结果也会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地理、气候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地形复杂,国土范围内部客观上存在着纵横交织、特征各异的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中国的降雨量由东南至西北依次递减,而地势则由东南向西北渐次增高,因此出现了东南低平而湿润,西北高亢而凉干的地理、气候差异。研究表明,唐宋以来,中国东南农耕区与西北畜牧区的人口、占地面积基本上保持着 20 世纪 30 年代统计的比例数字。即地理、气候条件优越的东南农耕区,占地面积约为 40%,而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地理、气候条件较差的西北畜牧区,占地面积约为 60%,近千年以来,人口比例一直在总人口的 10% 以下。同时,中国的地理环境客观上存在着由南到北的温度和湿度的渐次差异,决定了淮河、秦岭以南的中国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淮河、秦岭以北至秦汉长城沿线以南的中原一带,以粟作农业为主;而在秦汉长城沿线以北的北方地区,则以牧业为主。中国的地理、气候环境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构成了多民族共居、多种经济成分互立、多种文化类型并存的物质基础。加上地区环境相对优越的中原,由此形成了各民族内聚,多文化类型融合

^① 孔昭辰,杜乃秋:《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 年第 10 期。

^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的历史趋势,进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封闭

自古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据最新的考古学研究结果,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古文化就与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增强。比如,发现于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址中的丰富的石质容器和盘腿坐姿人像,与西亚和西南亚一带的古文化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而岩画中大量以突出眼睛为特征的神人兽面纹饰造型则与东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带的古文化密切相关。周、秦考古成果表明,源于草原地带的周、秦文化都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琉璃器、三棱铜箭头和屈肢葬等中亚、西亚一带的文化因素是通过周人和秦人传播到中原地区的。唐朝的首都长安、辽代前期首都上京、元朝的上都和中都,都是因为西北通道的客观存在而成为国际性都市的。这些都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多种渠道的联系的有力证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古代中国长期以来也一直缺乏对外开放、向外进取的动力。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中华先民的勤劳和智慧,使古代中国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度,因而产生了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而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国人从很早的时代起,就习惯于以“天下”和“四海”概念来构想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格局。这种构想是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长期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受地理气候环境影响,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人口,但分布很不均衡。秦汉之际,60%以上的人口都分布在中原一带;淮河以南的南方,长城以北的北方,均属地旷人稀地区。魏晋以后,随着北方民族的南下和江南地区的开发,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唐宋以后,形成了东南部农耕区人口稠密,西北部畜牧区人口稀疏的分布局面,由此造成了人口的增长和可耕地面积日益不足的矛盾。人们只能在所能得到的十分有限的狭小地块上精耕细作,对土地实行最经济的利用,借以维持生存。时日既久,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经济上对土地的过分依赖,一方面限制了中国古人对外扩展与开放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中华民族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这也是蕴藏在中华民族内部的巨大的凝聚力之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环境

(一)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由氏族到国家,这是世界文明史发展的通例。当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历史就已经由旧石器晚期出现的早期氏族制度进步到了氏族制度的繁荣和鼎盛时代,其显著标志即是以大型聚落中心和礼仪用器的出现为特征的社会分化现象的发生。

距今五六千年以前,中国南北各地的氏族社会普遍都进入了由氏族迈向国家的发展阶段,如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一带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一带的良渚文化等。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大国时代的到来。夏朝是诸多“邦国”的君长,势力所及,号曰“天下”。未及夏亡,东北方的商已成为大国,商朝末年,西方的周也成为大国,三者各有自己的开国历史。商汤征桀、武王伐纣,都联合诸多小国组成同盟军,最终推翻原来的宗主国而实现改朝换代。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传统礼制发展成熟,并且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展的根本规范。所以说,三代时期是中华文明获得重要发展的历史时期。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大国争霸,最终由秦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山东诸国,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从此,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秦汉之际,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匈奴汗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中原农耕帝国与北方草原游牧汗国长期互立并存的发展时期。

秦汉以后,经过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分裂割据,出现了隋、唐的统一,又经五代、两宋与辽、夏、金朝的分裂割据,最后由北方系统的元朝实现了中国全境范围内的、多民族的大统一。后来又经过明朝和北元的阶段性分立后,终于又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再度实现了元朝以来的全境大统一。

在清朝统治的 200 余年间,中华各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逐渐消失。及至清朝晚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各族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唤起了民族自觉意识,于是,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终结了中华文明的古代发展历程。

(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1. 宗法制度

宗法是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由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演变而来。在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以父系计算,父权家长支配着整个家族成员。父权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按父系继承,于是产生了一定的继承秩序。而一代代父权家长生前的功业和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在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权家长制基础上,对政治、经济特权的继承和分配等方面都做出了系统的规范,于是出现了宗法制度。至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出现了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度、宗庙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商朝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这种继承制度与商制相比,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

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从而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分封制度:分封制度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生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具体内容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把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诸侯国,诸侯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周围建立起诸多大夫之家,大夫再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地作士。西周的分封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实行的,即天子的嫡长子世代为天子,余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为诸侯,余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世代为大夫,余子为士,从而形成了层层相属、代代相袭的政治结构,可以说是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

宗庙制度:上古时代,奉祀祖宗、征伐不臣是最重要的两件国家大事。统治阶级利用宗法制度,通过祭祖,把宗族心理升华为阶级意识,从而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现实统治秩序。而尊祖敬宗,昭孝息民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遵行的社会行为模式。

西周以后,宗法制度始终贯彻通行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之中,家天下的观念长期存在,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忠孝一体,家国同构。

2. 专制制度

延续了 2 000 余年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显著特征。这种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完成于秦汉之际,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日渐强化和完备。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建了一个皇帝独裁、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为了确保皇帝独裁,在地方施行郡县制度,在中央施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官和中央官一律由皇帝任命,实行官僚制度。汉承秦制,使这种专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至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极限。这种独裁的专制制度使得君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区别于中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代中国,既不存在贵族分权执政的共和制,也没有神权凌驾皇权的教皇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另一方面,以天下大宗自居的历代君主,视天下如家庭,并通过自然经济陶冶出来的君臣伦理亲情与臣民沟通,直接干预臣民的生活,使自己的权力和威势渗透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君主是决不容许妨碍皇权专断的政治因素横置其间的,更不能容忍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3. 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一,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型发展特征,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范式的形成。其积极作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提倡“民胞物与”“克己待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做入问题上,表现为强调“慎独”“自省”,注重健康人格的培养;在行事上,表现为脚踏实地、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消极影响在于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观念,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结合,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

态的形成。其妙用是以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发展定型的原因。

第三,专制制度的充分发展,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在积极方面,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上、文化上普遍认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整体观念,因而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源泉;在消极方面,培植和强化了国人严重的迷信权力、服从权威的心态。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一)中国古代的早期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于农业。农业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创造了相应的文化环境,规定了特定的政治道路,同时还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面貌。

农业的发生是以人工驯化动物和栽培植物为最初契机和根本标志的。关于世界范围内农业作物的原生产地(仅就高粱、小麦、大麦、水稻、粟、稷、黍、玉米等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原生产地来说),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是水稻、粟和黍的原产地。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我国古籍中保留着种种传说,有的说神农氏发明农业,有的说烈山氏或炎帝之子柱发明了农业,而当代考古学成果表明,农业在我国的发生并不是某一地区、某位英雄人物的功劳。大体说来,居住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方远古先民是水田稻作农业的发明者,居住于黄河中下游和辽河中上游一带的北方远古先民则是粟、黍等旱地农作物栽培的发明者。

近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距今 10 000 年左右的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共存的文化现象。研究者刘诗中撰写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和严文明撰写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题》均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人工驯化稻类的文化遗迹。到了距今 8 000 年前后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类作物的驯化与栽培似有进一步的发展迹象。如在湖南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中,都曾发现古栽培稻的实物遗存。^① 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则确切地证明,至迟在距今 5 500 年以前,水稻的驯化过程已经在中国的南方最终完成。当时,栽培水稻已经成为江淮一带史前居民的基本生产方式内容。^②

旱地粟作农业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发生,似乎要更早一些。20 世纪 70 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近百个储粮窖穴中,遗有大量灰化谷物,发掘者认为这属于人工栽培的粟类遗迹。据测算,其腐朽之前的重量可达 10 万斤以上。^③ 这种情况表明,早在距今 8 000 年以前,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 8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第 12 期。

②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47 页。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北方地区的粟作农业,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初始发展阶段。据有关农学研究成果,粟和黍类植物与其他栽培作物相比,具有根系发达,吸收水分能力强,而发芽时所需水分较少和生长期偏短的特点,适合在我国北方地区干旱而寒冷的地区生长。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直接促进了社会其他经济门类的快速发展。比如铜器的发明,快轮制陶技术的普遍应用,养蚕缫丝和手工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制玉、漆器、建筑各业的大发展,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同时加速了社会分化。

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随着各地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为了实现对财富的占有和需求,在商业手段之外,往往借助武力掠夺。规模巨大、延绵不断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融,促使考古学古文化区域的重新改组和分布。与此同时,此间由于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和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吸引,促使周边各地,包括江南一带的古文化纷纷向中原内聚,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国出现的深厚历史背景。

(二) 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分野

由于地理、气候环境复杂多变,加之其他人为的因素,使得早期农耕文化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诸多土著文化互立并存,并相互吸收邻区文化因素共同发展的历史特征。据研究者童恩正所撰写的《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表明,大约在距今4 000~5 000年之间(夏商周三代),在环绕黄土高原的东起大兴安岭东南麓,北以阴山以北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抵云南西北部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气候环境发生了由暖湿向凉干的转变。受此影响,一方面,这一地带传统的农耕人口纷纷向以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迁移;另一方面,这一广阔地带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由原来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类型向后起以游牧射猎为主的经济类型的转变。从此逐渐出现了我国历史上长城地带以南的农耕区域,长城地带以北、以西的游牧区域的分野。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的出现要早于牧业文明,这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通例。而周边地带早期农耕人口和后起游牧人口向中原地带长期内聚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并非出于游牧民族的侵略成性。此外,农耕经济区与周边游牧经济区之间的界限并非长期不变,而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周期性冷暖变化而内外波动。而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从来都存在着一种密切的互补关系,如果人为地破坏这种关系,就会阻碍产业的正常发展。

(三)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耕与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有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冲突经常发生。据学者李学勤所撰写的《殷代地理简论》,殷商后期的甲骨卜辞中载有北伐鬼方、西伐羌方的记录。西周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冲突日益激烈,据《小孟鼎》铭文,康王在位期间(约公元前1079—前1053),鬼方与周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周人大败鬼方。穆王以后,玁狁(即犬戎,也称西戎)成为西周北边的严重威胁。至西周末年,西北犬戎势力壮大,最终导致了西周王室的倾覆和政权的东迁。